

世界文豪书系

海涅全集

HAINIE QUAN JI

2

河北教育出版社



Heinrich He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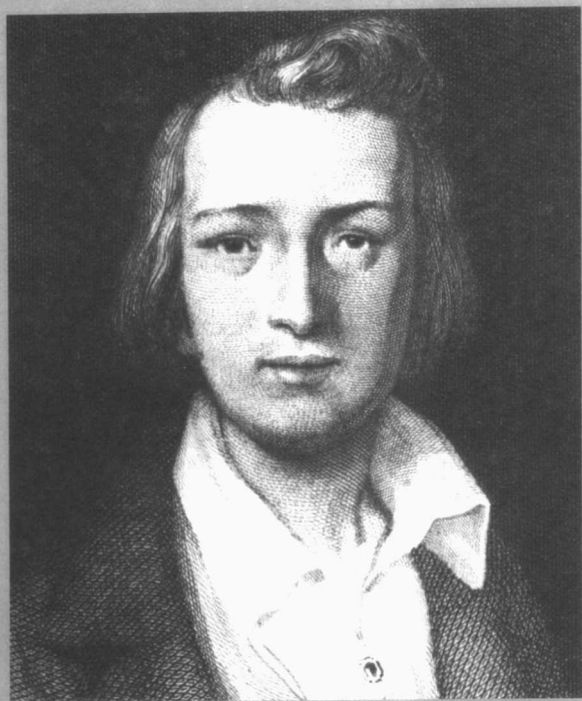
海涅全集

第二卷

韵文作品

章国锋 胡其鼎 主编

胡其鼎 译



海因里希·海涅，1836年巴黎。



海涅之伯父所罗门。



海涅之堂弟卡尔。



海涅之堂妹阿玛丽。



海涅之堂妹特蕾瑟。

EB263/02



奥地利首相梅特涅。



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

导 读

胡其鼎

《诗体悲剧附抒情插曲》出版于1823年，含《阿尔曼索》和《威廉·拉特克利夫》这两部悲剧，采用不押尾韵的自由韵律体。

1820年秋，海涅在波恩动笔创作《阿尔曼索》。1821年2月，他被格廷根大学劝退前完成了一半。3月，他到汉堡，伫立在他的堂妹阿玛丽窗前，体验剧中阿尔曼索在苏莱玛窗前唱歌的场景。之后，在柏林《伙伴》杂志上发表了片段。全剧可能完成于1822年1月底。这部悲剧的爱情母题取自波斯诗人内扎米（1141—1209）根据阿拉伯故事所写的长篇叙事诗《莱伊丽与马季农》。剧情的历史背景是1492年1月摩尔人（西班牙人对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称谓）在西班牙格拉纳达所建王国灭亡之时。史料依据西班牙佩雷斯·德·伊塔所著的《格拉纳达内战史》。主要剧情如下：摩尔人本·阿卜杜拉和阿里是好友。后者得子名阿尔曼索，前者得女名苏莱玛，双方替儿女定下终身大事并交换抚养。格拉纳达被西班牙人攻陷后，阿里和本·阿卜杜拉之女苏莱玛皈依天主教，保住财产，留在西班牙。本·阿卜杜拉则坚持其信仰，携阿里之子阿尔曼索回到北非，途中夫妇二人相继病故。阿尔曼索返回西班牙，在本·阿卜杜拉的管家哈桑等协助下，于苏莱玛同一西班牙骗子结婚之日抢走新娘。阿里得知抢亲者是自己的儿子后，一路追赶。阿尔曼索抱着苏莱玛跳崖而亡。这部悲剧的主题是终场前阿里讲

的一句话：“神的凯旋金车高傲威严地驶过的道路，那里的爱神木和百合花会被连根铲除。”换言之，宣讲爱邻与宽容的基督教，当它在欧洲取得统治地位时，却迫害异教，造成无辜者家破人亡。阿尔曼索其实是身穿摩尔人服装的犹太人，海涅借此人物诉说他对犹太人受歧视的不平。但他又通过阿里这个人物表明他本人的观点：为了生活在祖国（犹太人都把自己的出生地视为祖国），为了生活在先进的文明社会，改变宗教信仰也无可非议。在语言方面，海涅吸收了波斯和阿拉伯文学中的形象比喻和拟人化手法。海涅曾在致友人的信中说，阿尔曼索和苏莱玛在花园里基督像前会面一场最难写，海涅把他本人连同他的矛盾、他的智慧、他的爱情、他的疯狂都扔进这个剧本里去了。可见此剧含有作者的自白因素。《阿尔曼索》经不伦瑞克民族剧院经理克林格曼改编，于1823年8月20日上演，但并不成功。当时的评论引用施莱格爾的论点：悲剧必须是刚烈的，指出该剧不该称作悲剧。海涅去世后，保罗·林道于1899年在柏林导演此剧，但仍无反响。

《威廉·拉特克利夫》是海涅于1822年1月底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可能在一家咖啡馆里）三日内一气呵成的，原分十七场，采用不押尾韵的自由韵律体。故事发生在当时的苏格兰。爱德华·拉特克利夫热恋美人贝蒂，贝蒂嫁给麦格雷戈，爱德华仍迷恋贝蒂，被麦格雷戈所杀，贝蒂受惊身亡。爱德华之子威廉，被爱德华和贝蒂的亡灵纠缠，两度在麦格雷戈之女玛丽亚新婚之夜杀其夫君，但第三次未得手，遂杀死玛丽亚和麦格雷戈后自尽。这出鬼魂复仇剧后被译成法文，1849年发表在《巴黎周刊》上。1852年又被海涅收入《新诗集》第三版，替换了《德意志，一篇冬日童话》，并写序言指出，在剧中盗贼骗子投宿的林中客店一场中，他明确地提出了他的政治观点，即必须重视“喝汤”（吃饭或贫困）问题，犯罪是由社会分化、贫富不均所造成。海涅一直争取上演此剧，1847年他在巴黎又问过剧作家海因里希·劳伯（1806—1884），后者

说，海涅的两部悲剧都是长不大的胎儿。海涅去世后，《威廉·拉特克利夫》被改编成歌剧脚本，于1875年在意大利上演。之后又有皮埃特罗·马斯坎尼（1894）、毛里蒂乌斯·瓦夫里内兹（1895）、科内利斯·道佩尔（1909）等作曲家为之谱曲。这是海涅本人所没有预料到的。

这两个剧本涉及海涅一生都在关注的两个问题，一是犹太人的解放，这不仅是宗教、民族问题，也是社会政治问题；二是他所谓的“喝汤”问题，亦即贫富不均、社会分化问题。这两个问题也反复出现在他后来的作品里。

《新诗集》发表于1844年，是海涅自己编选的第二部诗集，同他的第一部诗集《短歌集》（1827）相距十七年。在这段时间内，他的作品以散文为主，但并没有放弃诗歌创作。在这段时间内，海涅经历了不少坎坷：

1827年11月他到慕尼黑，为出版商科塔（1764—1832）的《普通政治新年鉴》做编辑工作。他想要在慕尼黑大学谋得教席，便托科塔把他的《短歌集》和两卷《游记》献给表面上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巴燕（按英译作：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1786—1868），此外，巴燕内务大臣封·申克（1788—1841）又是海涅所熟悉的同乡，但是没有成功。1828年夏，特蕾瑟·海涅在汉堡同阿道夫·哈勒博士结婚。海涅去了意大利。12月2日，海涅的父亲去世。1829年12月，《游记》第三卷出版，反应冷淡。

1830年巴黎爆发七月革命，正在彷徨的海涅获悉后，在8月10日的日记中自称是革命的儿子，他全身心地欢乐与歌唱，利剑与火焰。他知道了自己想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他将用鲜花、诗琴和话语去进行决死斗争，话语好似燃烧的星星从天空射下，焚毁宫殿，照亮茅舍。1831年5月初，他抵达巴黎，次年以通讯记者身份为奥格斯堡《总汇报》撰文。此前海涅同他的伯父所罗门·海涅闹翻。

由于评论家门策尔（1798—1873）发表批评古茨科的小说

《多疑女子瓦莉》的文章，引起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注意，促使德意志联邦议会于1835年12月10日颁布政令，要求各邦政府用刑法和警事法对付名为“青年德意志”或“青年文学”的知名文学流派的著作的作者、出版者、印刷者和发行者，并用一切法律手段阻止这些著作的传播。提到姓名的作家有海涅、古茨科（1811—1878）、劳伯、温巴尔格（1802—1872）、蒙特（1806—1861）和居纳（1806—1888）。海涅的作品不但是已出版的，甚至包括今后创作的，都在禁止之列。海涅不得已接受了法国政府每年四千八百法郎的养老金，自1840年起支付。

1838年初，海涅打算在巴黎办一份德文报纸，为该报能在普鲁士发行，他给普鲁士外交大臣封·维尔特男爵（1772—1859）写了一封信，并托瓦伦哈根从中斡旋，但他的合作意愿仍遭普鲁士政府的拒绝。同年，所罗门·海涅到巴黎，答应给海涅四千法郎的年金，1842年增至四千八百法郎（占海涅年开支的三分之一）。海涅当时和巴黎一鞋店女店员玛蒂尔德（原名克蕾桑瑟·欧仁妮·米拉）同居，他俩1834年相识，1841年才正式结婚。

1840年，海涅发表《路德维希·伯尔纳。一份备忘录》一书。伯尔纳（1786—1837）是同海涅齐名的德国犹太作家，七月革命后到巴黎，发表《巴黎书简》，在德国政界，在自由主义在野党中有广泛影响。他是共和主义者，认为实行共和制便能解决一切问题。海涅与他看法不同。海涅认为实行共和制或限制君主制只是革命的外表，而革命的深层问题则涉及人民的物质福利。海涅相信，由于工业和经济的进步已经有可能使人们摆脱其物质贫困并在尘世得福。海涅还认为，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圣-鞠斯特所说“面包是人民的权利”，乃是整个革命时期最伟大的一句话。1835年5月，伯尔纳在巴黎《改革家》上发表《女人闹别扭》一文，称海涅是有才华而无人品，是可收买的贵族主义等，伯尔纳在世时，海涅避免同他正

面冲突。海涅发表此书，本想引起对伯尔纳问题的讨论，但由于书中有关伯尔纳与其女友让内特·沃尔的文字惹起轩然大波，海涅除了遭到伯尔纳的追随者的无聊诽谤外此书毫无反响，他所说的民主、历史和革命也无人理解。当时，德国国内的情况也起了变化。1840年6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795—1861）登基为普鲁士国王，自由主义在野派对他抱有幻想。同时，法国在东方危机过程中外交上失败后，报界扬言要同德国打仗，内阁中也有人声称莱茵河是法德疆界。这激起了德国朝野一致的民族主义声浪的高涨。尼古拉乌斯·贝克尔写了《德意志的莱茵河》（通称：《莱茵之歌》），那种民族主义的语言同普鲁士太子党（即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还是王储时以他的教师安西隆〔1767—1837〕为首的一批官僚与容克）的语言如出一辙（见“时事诗”第六首《守夜人来到巴黎时》）。对于海涅来说，这是严峻的一年。

1841年7月，海涅在法国和西班牙交界处高特莱温泉疗养，着手写《阿塔·特罗尔》。9月7日因《伯尔纳》一书引起的诽谤同所罗门·施特劳斯（伯尔纳的女友让内特·沃尔的丈夫。这对夫妇在巴黎同伯尔纳住在一起。）决斗，海涅受轻伤。接着，产生编《新诗集》计划。1841年冬和1842年春他完成《阿塔·特罗尔》，1843年1月至3月在劳伯主编的《时髦世界》上发表，但经劳伯删节，到1847年才出单行本。

1843年10月21日，海涅离开巴黎经陆路返回阔别十三年的德国，29日抵汉堡，与老母重逢，所罗门·海涅为他举行欢迎舞会。12月26日回到巴黎。12月29日到1844年2月初已完成《德意志，一篇冬日童话》的主要部分，写作因患眼疾而中断。3月中病情好转。到4月17日已只缺结尾。1843年底，海涅结识卡尔·马克思（1818—1883）夫妇。1844年2月，他在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卢格（1802—1880）和马克思合编的《德法年鉴》上发表《路德维希国王赞》。4月16日，普鲁士政府发出命令拘捕《德法年鉴》的编辑。5月底，海涅将

《新诗集》（附《冬日童话》）的手稿寄给汉堡出版商康培。这个集子的篇幅超过二十印张，按当时法令可免于检查。5月至7月，海涅在巴黎德国侨民的《前进报》上发表诗歌，其中有著名的《西里西亚织工》。7月11日，普鲁士政府又下令拘捕《前进报》编辑。拘捕令上也有海涅的名字。7月底，海涅在玛蒂尔德陪同下取道海路去汉堡，亲自监印《新诗集》（附《冬日童话》）。9月底出书。10月16日海涅回到巴黎，但康培的信已先他而至，因为普鲁士政府于10月4日没收此书，11日通知各邦政府禁止此书。康培紧接着出版第二版。海涅在汉堡时，已将《冬日童话》的校样寄给了马克思，马克思将此作品发表在10月至11月的《前进报》上。1845年1月，法国政府下驱逐令，马克思被迫离开巴黎去布鲁塞尔，行前，于1月12日致函海涅，约他为《莱茵年鉴》撰稿，并说：“在我要离别的人们中间，同海涅离别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我很想把您一起带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第457页）《冬日童话》于海涅在世时就出版过这三次。1852年《新诗集》出第三版，海涅用诗体悲剧《拉特克利夫》换下了《冬日童话》。1853年，《新诗集》又出第四版。1844年出第一版时，由于普鲁士政府的禁令，德国报刊都不提及此书。随后的一些书评表明，从掌权者到一般的自由派到市侩庸人都站在一条阵线上反对海涅，但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海涅这部诗集的发表本身就是一次惊人之举，引起了莫大的惊恐。海涅的旧友劳伯撰文称赞海涅的诗艺的天才，他的新朋友、汉堡的弗朗索瓦·维勒抨击市侩庸人，在巴黎的社会主义者认同海涅对普鲁士的批评，但这并不能改变当权者所控制的舆论。瓦伦哈根在收到海涅的赠书后，于1844年10月19日复信说：“你的新的诗引起了最大的轰动，赞赏的喊声和惊骇的叫嚷在竞争；所有的声音一致承认诗艺的充分实力和天才的高度发挥。”他在10月15日的日记中说，海涅第二次获得了崭新的诗人的荣誉，他的新的集子证明了最伟大的天才，他有权称自己是阿里斯托

芬^①的儿子。这些诗人（指海涅、弗赖利格拉特）给国王造成很大的损害。瓦伦哈根，这位普鲁士退休外交官，尽管政治观点不同，但他一如既往懂得正确评价海涅的诗才，他的这些话也反映了《新诗集》出版后在德国的反应的实情。

《新诗集》收自《短歌集》出版后，即自1827年起直至1844年所创作的诗歌。

第一部分“新的春天”（1827—1830）包括序诗和四十四首，其中一部分发表在《1829年女士便携书》和1831年的《晨报》上，并全部收入《游记》第二卷1831年第二版。序诗及其中的二十四首，是受作曲家阿尔伯特·梅特菲塞尔的委托，为《春之歌》组曲写的歌词。序诗套用了古希腊抒情诗人阿那克里翁（约前570—？）的母题：诗人想歌颂战争，他的诗琴却弹出了爱的乐音。海涅以此暗示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他作为作家的心态，他当时（11月间）既沉醉于自由，又太过清醒地冷眼旁观。他已看到，七月革命有利于市民贵族，而市民贵族扮演当前革命的历史发展的反对者的角色，是比旧贵族更可憎的。所以，他没有去歌颂这场革命，而是唱起了春之歌。这二十四首（第二、六至九、十三、十六至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三十、三十一、三十八、四十、四十一）是一个并非初恋的男子的忧郁的歌，他渴望爱的宁静，却又意识到，只要世上有斗争，便不能沉湎在这宁静之中。第三十五首使用了隐喻，如“秘密”、“无焰火”，后者喻思想启蒙和破坏，把“无焰火”藏在“百花林”中，喻把诗人的社会思想藏于诗艺之中，即通过文学形式来表述。这也就是海涅所说的，“鲜花党”（指诗人）同革命结合。第三十六首又用夜与昼、暗与明、梦与醒等隐喻形容诗艺变化莫测，但诗人做着梦唱出的串串妙音并不会由于梦醒而丧失其底蕴。这预指海涅今后的创作特色，就像德国音乐家舒曼称波兰音乐家

① 阿里斯托芬（约前446—前385），古希腊喜剧诗人。

肖邦(1810—1849)的钢琴曲是花丛中的大炮那样。其中的第六首“悄悄地掠过我心境”仍是《抒情插曲》的风格,又吸引了像门德尔松这样的作曲家为之谱曲而广为流传。其余的二十首分别作于1822、1827和1828年的不同场合,正文均有脚注说明。

“杂诗”中的《弗里德丽克》和《艾玛》写海涅对自由派作家路德维希·罗伯特之妻弗里德丽克的一段恋情,两人在1824年4月海涅为谋职第二次去柏林时相识,“相爱数月后,未得一亲吻”,1829年四五月间又在波茨坦重逢。除此之外的以女性姓名为题的那几组诗,都写海涅在伦敦和巴黎与妓女的交往。弗兰茨·梅林(1846—1919)在《海涅评传》中说,这些诗写得大胆,甚至非常放肆,海涅运用古老的诗人的权利,同古罗马讽刺诗人贺拉斯(前65—前8)一样,使这些放荡的妓女芳名永存。这些诗的美学价值也不小。1831年5月,海涅抵巴黎后便接近圣西门主义者。1832年1月,圣西门主义者领袖昂方坦(1796—1864)、舍瓦利埃(1806—1879)等遭警方迫害,后于8月27日被判刑。作于8月底的《赛拉芬》便是对这一事件的直接反应。海涅在诗中断言,这个组织虽然瓦解,但圣西门(1760—1825)的学说仍将产生影响。圣西门在《新基督教》一书中主张消灭贫困并增进贫穷阶级的物质文化福利。昂方坦等圣西门主义者又提出了“肉体复权”的主张,还认为当前正处在以宗教体系的统治为标志的封建社会的解体阶段。海涅接受了这些观点,在《赛拉芬》第七首里,他提出了他的《新约》,他的教义:“长期迷惑我们的‘两回事’已被一笔勾销。”“两回事”指基督教以原罪为基础的禁欲主义所宣扬的肉体受苦和灵魂得福。现在应该让肉体复权,应该以感官享受取代禁欲苦修。海涅所说的感官享受,即指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屋住,有工作做,有恋爱和结婚的条件,人类应该争取尘世的幸福并在地上建立天国。昂方坦曾说,神乃现存的一切,一切通过神并在神之中,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有神

的生命。海涅对此话加以发展：神乃现存的一切，神既是物质，又是精神，物质和精神都是神性的，谁亵渎神性的物质，也即亵渎神性的精神，都是有罪的（参见《论德国的宗教和哲学》）。海涅就这样把圣西门主义当作一种新的宗教教义。《奥唐瑟》是进一步宣扬经过海涅加工的圣西门主义的肉体复权或感官解放说。其中第三、四、五首是核心。第三首暗示卢梭（1712—1778）曾创造泰初有幸福的神话以及他所主张的自然感官享乐主义。第四首是据此对《圣经》中的所谓“原罪”神话重新进行解释。第五首讲自从有了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就不再有爱与欢。但是那些君王，那些统治者，却天天在肉体复权。在所罗门（前 972—前 932，以色列和犹太国王）时代，女子被认为是由神规定服务于男子的女奴，而现在，按照新学说，女子应是求解放的女伙伴。《安热莉克》的背景是：德国民族自由主义者中的右翼保守派和左翼激进派都反对海涅，以海涅的拙劣模仿者为例，指责海涅轻浮放荡。海涅则抓住两派言行不一的伪道学进行反击，并划清他本人与他的模仿者之间的界线。《汤豪瑟》取材于中世纪骑士传说，又结合海涅的一段生活经历（他认识玛蒂尔德后就和她同居，不久又为避开她而离开巴黎，最后又回到她的身边），矛头直至教皇，教皇是束缚社会进步的旧教条的维护者，是不自由的象征。这首诗作于 1836 年，因此也是对德国联邦议会 1835 年迫害青年德意志作家的政令的答复。《创世歌》乃是海涅的对自己的创作以及批评目标的反思。

“罗曼采”中的第一首和第六至十三首连同“杂诗”里的《卡塔琳娜》曾收入 1840 年出版的《海·海涅的沙龙》第四卷。收入《新诗集》的二十三首罗曼采以及《冥界》（五首）多半产生在 1840 年左右，并无中心主题。作为罗曼采，亦即篇幅较短的故事诗，《骑士俄拉夫》、《阿利·拜》和《梅特夫人》在艺术上是比较成功的作品。

“什锦诗”，Zur Ollea，这个标题的来源是 Olla Potrida，系

西班牙的风味菜，是肉、香肠和蔬菜的杂拌。这十首诗作于1844年以后，是《新诗集》1851年出第三版时，由于用《威廉·拉特克利夫》换下了《冬日童话》，全书篇幅减少而加上去的。

“时事诗”二十四首，多半是1844年发表在巴黎《前进报》上的政治讽刺诗。在《集外诗》中还有五首，由于在德国已属被禁作品而未收入《新诗集》。

“杂诗”中的主题：唯灵论同感觉论、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同圣西门派的肉体复权的对立，仍在这三组诗里延续，如“罗曼采”第十七首《更换》，“什锦诗”第二、八、九、十首，还有“时事诗”第十四首《孩子》和第二十首《只管放心》等。这最后一首诗讽刺德国人的忠君思想，说德国人不会成为谋杀恺撒（前100—前44）的布鲁图（前85—前42），不会弑君谋叛，因为基督教及其禁欲主义支配着人的思想，使德意志成为“虔诚儿童的养育所”而非“罗马的杀人凶手窝”。后来，恩格斯（1820—1895）在垂暮之年所作的《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中借用了海涅的这个比喻，讲到30年代圣西门派的肉体复权在德国这样一个“虔诚儿童的养育所”里曾引起过“难以置信的恐惧”，并且幽默地说，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高贵等级，倘若“不经常使自己的肉体复权就一天也活不下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539—540页）。“罗曼采”第十二首《贝特朗·德·博恩》就以一个有钱时可出入宫廷、没钱时便受人唾弃的妓女为例讥讽这种伪道学。这一主题的诗歌，构成了《新诗集》中脍炙人口的部分，也表明了海涅在思想上受圣西门主义影响之深。

“时事诗”使海涅赢得了政治讽刺诗人的称号，并且第二次获得了崭新的诗人的荣誉。这些政治讽刺诗有的针对德意志的现状和德国人的劣根性，有的针对基督教，有的针对如哲学家谢林（1770—1854）、法的历史学派等御用文人，有的针对民族主义自由派，有的针对自由派中的左翼，如一度对弗里德

里希·威廉四世抱有幻想的诗人黑尔韦格（1817—1875），尤其辛辣的是针对德意志联邦中两个大国的国王，一是讽刺被誉为艺术保护人的巴燕国王的《路德维希国王赞》，一是抨击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毛驴血统》、《掉包留下的怪孩子》、《中国皇帝》和《新亚历山大》。这位普鲁士国王登基才四年，海涅就通过他的一些举措来揭露他的权势欲和政治野心，如决定建成科隆大教堂和支持德国教会中反罗马教皇的教士以期控制教会；如聘请哲学家谢林、法的历史学派的教授们、体操运动倡导者马斯曼（1797—1874）、画家科内利乌斯（1783—1867）到柏林以及请浪漫派诗人蒂克（1773—1853）导演索福克勒斯（前497—前406）的悲剧《安提戈涅》，为笼络保守的知识分子，使意识形态更趋反动；如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加强军事实力。为揭露这位国王的欺骗性，海涅还提醒人们勿忘这个霍亨索伦王室的历史。马克思在《霍亨索伦王朝的丰功伟绩》（1849）一文中就引用了《掉包留下的怪孩子》中的诗句，随后说：“谁不知道那个姓霍亨索伦的下士家族是靠着在继承方面昧良心、搞阴谋、耍流氓而爬上去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571页）海涅的这些讽刺诗，尤其像《新亚历山大》和《路德维希国王赞》，都写得非常机智，也表明他具有敏锐的目光。

《教义》、《警告》、《秘密》、《倾向》这几首诗表达了海涅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见解：诗人必须是个“好鼓手”，但是面对德意志的监狱与皮鞭的统治以及书报检查制度，诗人必须讲究策略，注意隐蔽，文学作品毕竟是艺术品，成天价地“吹、震、响、杀”必定流于空喊口号，流于“一般化”，故而不赞成当时流行的“倾向诗”。

1844年6月，普鲁士西里西亚的朗根比劳和彼特斯瓦尔多两地发生纺织工人饥饿暴动，遭军队镇压，死十一人伤二十四人。海涅闻讯后即作《西里西亚织工》一诗，7月10日发表在《前进报》上。11月，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